

当前在线: 667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扫描

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扫描

2007-05-24 刘兰兮执笔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点击: 504

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扫描

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扫描

人文社会
(中国经济史研究篇)
前沿扫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5月8日

1 学科发展的历史与主要成就

中国经济史学是一门介乎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从创立至今,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果。中国经济史学产生于上个世纪初,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建立以前,为学科初创时期。20世纪初,一批接受西方近代史学、经济学的学者创立了中国经济史学。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经济制度的探讨,或者是对某一产业部门或行业的研究,或者是对中国近代某一项经济活动的调查或统计。

第二阶段:新中国建立至“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5年),为中国经济史学初步发展时期。建国后,学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经济史——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受到学者的重视。当时历史学界盛开的“五朵金花”,即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多与经济史研究相关,有的本身就是经济史的研究专题。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1965~1976年),为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受挫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几乎停顿,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

第四阶段:1977年至今,为中国经济史学获得较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学术论著大量问世。据统计,自1986年至今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的数量,远远超过20世纪前80年有关论著的总和。

2. 研究领域扩展。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主要围绕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专题展开,近代经济史则主要以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剥削本质。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有了很大拓展,市场、交通、金融、财政、消费等受到学界的重视,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也引起学者的关注:部门经济史、专题经济史、区域经济史、民族经济史、海洋社会经济史勃兴,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新观念的引入,改变了原来的研究视角,也拓宽了研究领域,如近年对生态农业、环境史视野下的经济史的研究悄然而兴,丰富了原有对农业史的研究。

3. 理论方法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考古学、民族学、人口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推动经济史研究方法向“多元化”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的繁荣。

4. 注重实证研究的学术风气，自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全国大讨论后，近20余年来，对某一重大问题作全国性大讨论的盛况不再。有论者认为，回避重大历史问题、重大历史现象和大规模社会变动的研究与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的基本特点。近些年，经济史学工作者在挖掘、整理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资料种类大为增加。除过去惯常使用的官书、方志、文集外。考古发现、文献档案、契约文书、族谱、碑刻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田野调查的引入则为史学研究积累了新资料。与此相应，大批实证研究成果问世，造就了经济史学的辉煌。

5. 学术流派逐步形成。在中国经济史学的长期发展中，国内的经济史研究，因理论方法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风格或流派，大体上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

当然，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陷或问题。首先，理论方法滞后。在最近的20多年间，经济史学同仁为改进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付出不少努力，一些学者重新释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探索：一些学者积极介绍、引进西方的理论方法，评说各种理论方法的长短利弊：一些学者则在建立中国经济史学理论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不过，与经济史学的任务相比，与大量实证研究对理论的需求相比，国内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仍显滞后。其次，综合性、贯通性的研究不够。国内的经济史工作者大多将历史过程中某一时段的经济状态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求研究的深入细致。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却难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再次，改进研究方法过程中发现不良倾向。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实际是受西方理论影响逐步发展起来的。如上所述，近年一些学者改进研究方法，带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向多元化发展，促进了经济史学的繁荣；但在引进西方理论方法时也存在不良倾向，一些学者急于标新立异，对西方理论方法不求甚解，行“拿来主义”，以致在研究中出现食洋不化、削足适履的现象。最后，学术研究中存在重成果数量、不重成果质量的倾向。在大量问世的学术成果中。确有资料翔实、分析入微、超越前人研究的精品，但也有不少“炒冷饭”的低劣之作。

2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

环境与经济发展是21世纪的热点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经济史学者试图借鉴国外环境史的分析模式，解读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环境史与经济史的关系

李根蟠认为，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考察，具有革命性意义。使史学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增长点。在环境史视野中观察经济史，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等方面，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夏明方主张在引进环境史的研究方法的同时，吸收原有研究范式的合理成分，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曾雄生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环境对经济的制约，而当代环境史的研究多注意经济对环境的破坏，二者都失之于片面。环境史与经济史研究的结合，更多的应该是研究问题，而不是“主义”。阎守诚赞成“自然进入历史”，即从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统一和互动去考察历史，强调它应是“全方位”的，认为现代生态学把世界看成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若把三者的排列改为“社会—人—自然”更为合适。因为自然与社会的互动是通过人进行的，人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历史是人创造的。

二、环境史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问题

徐旺生考察了中国环境历史的演变机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不计成本，即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不计成本，老百姓为了传宗接代不计成本，导致土地被过度利用，进而造成生态环境变迁，灾难频仍。方行以清代江南为例，探析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可以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大体

相同的地区呈现出差异性。江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使其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韩茂莉探析了近代山陕地区围绕水利灌溉而形成的水利管理系统，指出以维护水权为核心的基层管理体系包容了乡村社会的诸多层面，其中乡绅、大户结成具有渠长人选资格的水权控制权在水利管理中起重要作用。

邹逸麟追溯了我国水资源的变迁，认为当前我国环境问题，实由历史积渐而成。以黄河流域为例，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入侵，黄河上游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屯垦戍边，成为汉族王朝长期的国策，以至积千年之累，西北地区水资源消耗殆尽。黄河中游关中地区因千年建都，统治阶级竭泽而渔，随着森林的大量砍伐，水资源也濒临危机。黄河下游平原则因自西汉以来单一农耕经济的确立，庞大帝国为满足粮食需求，进行极度开发，加上中上游水土流失的影响，河道淤浅，湖泊淤塞，水环境逐渐恶化。汉唐的繁荣实以牺牲黄河流域环境为代价，但实出无奈。这是我国数千年来两难的抉择。

圩田是我国江南人民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开发的一种独特形式。庄华峰描述了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的历程与特点，剖析了江南圩田兴盛的历史因素，并具体探讨了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因过度围垦破坏了江南地区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环境，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历代地方政府在圩田管理方面各自为政，各地圩田缺乏相互间的协作，使因破圩而形成的局部水灾年年有之：大量构筑圩田，使湖泊面积为缩小，影响其调节水量的功能，破坏了本地区的生态条件，致使灾害频频发生。此外，围湖特别是废湖以后，使众多的水生资源也遭到了严重破坏。甘肃、青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在的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错杂居的地方。入清以来，人们的经济活动已形成农牧业交替或各自优势并存的格局。赵珍认为，这里的生态环境恶化，除了原本就脆弱外，还与人类不适当的经济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为此展开过争夺草场和耕地的纷争，结果导致生态失衡，人居自然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社会矛盾激化。

张家炎认为，应区别“环境”与“生态”，环境主要指地形、地貌、水系、土壤等自然条件，生态则包括环境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人类活动。这种体系定义为生态系统，其中环境与人及社会经济结构间种种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则定义为生态关系。他批评斯密与舒尔茨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只考虑市场。而忽视环境因素，不能合理地解释经济现象，并以汉江平原为案例，揭示了环境因素对农民经济行为的“驱动”作用。张氏认为，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江汉平原，农民的确介入市场，但这种介入并非决定于回报，更多决定于环境的宏观变迁。当地农民进出市场或是否与市场联系与市场驱动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尽量适应环境、降低风险的效果最大化选择。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江汉农民选择某种作物或谋生方式主要是应对多变而脆弱的环境以确保维持生存。

3 有关中国古代社会『三农』问题的研讨

2006年7月中旬，中国经济史学会与江西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经济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三农”问题是此次大会讨论的重要议题。参会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促进了经济史学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

李根蟠探讨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特点。认为确立于战国秦汉的小农经济体制具有天然的内聚力，因而指挥、调度、转型都很灵活，成本很低，有较强适应性和再生能力：但是细小、分散的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极不稳定和极易分化，铸就了小农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弱势地位，许多问题由此而生。秦晖批评学界流行的农村社会研究理论，认为在过去认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模式中影响最大的“租佃关系决定论”与“乡村和谐论”，皆属理论虚构，难以考实，提出把地权问题说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首要问题，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从而把平均地权说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是没有根据的。

黄今言考察了汉代农民的“背本趋末”，指出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历时长、地区广、人数多。其“事末”范围涉及铸钱、经商、为“庸”等多个领域。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与赋税征课货币化及农民的土地得不到保障有密切关系。陈金凤认为，汉武帝统治时期因人与地矛盾上升、土地兼并

盛行、自然灾害等原因，流民问题十分严重，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郭松义提出，考察历史上的农民不能只凝注附着土地的劳动者，对于那些离乡离土的、特别是进入城市农民的工作和生活，也应纳入视野。实际上，明清以来城镇的蓬勃发展，已使农民无法置身于局外，至于他们进城后的角色转换，真正溶入城市，则牵涉到国家政策、社会接纳程度和他们的思想认同等多个方面。黄志繁、邵鸿通过对徽州排日帐的解读，比较细致地分析了小农的生产与生活状况，指出徽州小农一年之中有很多闲暇时间；徽州小农在农业生产之外一般都经营多种副业；徽州小农农忙时间多以亲属互助的方式来弥补家庭劳动力的不足；与周流天下的徽商相反，徽州小农很少外出活动。

关于古代农业，温乐平详细考察了秦汉时期牛的类型与产地分布、牛的牧养与管理经验、养牛业进步的表征及有关牛耕推广等问题。刘玉峰提出，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不仅表现在粮食作物的生产、销售以及农产品的技术加工方面，而且表现在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农副业等方面，它们共同代表了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新的态势和动向。

关于传统农村市场，方行对传统社会的土地经营权交易提出新的看法，指出土地经营权进入市场，促进了土地资源在佃农之间合理流动，优化了资源配置；经营权正式成为商品，即地主将土地经营权转让与佃农，可以使佃农有长期打算，乐于对土地连续追加投资改良土地，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李平亮认为，清中叶江西农村墟市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墟市数量的增长、墟市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专业市镇的兴起，并形成—个由不同层级的市镇构成的市场网络并促进江西经济与外界的交流。

关于传统农村社会，徐旺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官民对称的二重结构，二重结构的缺点是缺乏中间层，无法培育出皇权与百姓之间的缓冲层；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性质既不完全是血缘共同体，也不完全是地缘共同体。卞利对明清时期徽州的乡例的内容、特点及其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探讨。

4 有关中国近代“三农”问题的探讨

陈争平倡议用外部型理论研究“三农”问题，认为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资金周转慢，技术进步滞后，较强地依赖于自然环境，农产品价值实现的难度较大，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容易被迫接受外部成本或流失外部收益等特点，将外部性理论与“三农”史研究结合起来，有利于为“三农”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分析工具。

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民借贷，汤可可以无锡为个案，观察、分析近代江南农村借贷关系的发展与转型。张天政对民国时期国家金融机构及地方当局在该省的农业生产放贷活动进行探究，充分肯定了国民政府对农业生产贷款的积极作用。游海华以1934~1937年赣闽边区农村合作问题，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见解。认为正是农村合作运动，使得农村合作在边区“战后救灾”中，能够充分发挥它的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功能，并启动与刺激了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复苏进程。曾斌对民国时期福建农村金融支持模式变迁进行了探讨，认为福建较早引入了农贷这种金融支持的新形式，对福建农村的部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农贷对民国时期福建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朱荫贵将日本侵华时期所作的河北省良乡县吴店村的调查材料进行分析，认为可从中了解当时中国北方农民需要借钱的大体比例；借钱时的求助顺序；所需要的抵押品；借款时的程序和契约书的内容；土地典押和其中的各种变化等。

工业化与三农的关系也是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高伯文考察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与解决三农问题路径的关系，新民主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认为限于历史条件和受实践经验的制约，这些新民主主义的探索虽未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展开，但其探索价值却非常宝贵，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翔根据新近发掘的历史档案资料，结合方志、报刊等资料，探讨了近代冀南土布与西北毛皮的互补性贸易关系。

5 有关中国现代“三农”问题的研讨

怎样解决贫富关系问题是一个“千年难题”。这个难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与两极分化的关系。张忠民认为，“三农”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古老命题。其实质是一定剩余水平下的农民公共负担问题，这是解析该问题的逻辑起点。李占才分析了取消农民税费与裁撤乡镇政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彻底减轻农民负担。只有裁撤乡镇政府，加强村民自治，才能使因官多和追求“有为”管理而扰民、加重农民负担的最根本的“症结”得以彻底解决。陈勇勤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三农问题的“关键与根本”并非农民问题，应当是农业问题。农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价格与就业两个领域，发展农业要关注经济效率。其与就业和价格相关，农业劳动力过剩引出农民问题，农业纯收益分割引出农村问题。

温锐对农民问题研究的“成说”进行反思并提出新的见解，肯定了家庭经济是一种具有自发向上和自我激励功能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较强的和具有不断打破常规、激活现状的动态型与开放型的生产经营模式：认为中国农民在实现自立和代表自己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陈廷焯着重回顾了1958~1965年农业发展过程与政府的政策措施。认为1958~1960年间农业发展遭到严重挫折；1961~1965年在调整中得到恢复。赵学军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实行预购定金制度。在农副产品统购制度下，农副产品预购定金属于证约定金，不具备罚则效力，但却有突出的预付货款特征，其实质是预付货款与定金的合二为一。徐建青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及其实施对传统乡村工业(手工业)以及对以后整个农村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赵梦涵把加入WTO与山东省农业公共政策调整结合起来思考分析与研究，一方面，加入WTO确实要求山东省的农业公共政策必须有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很难把所有的公共政策调整都与WTO联系起来。陈夕、谢文雄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55年上半年，毛泽东所设想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符合国情，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195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对国情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忽视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使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遭受了挫折。

武力、朱文强以先后4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资料为例，说明农业土地经营的小型化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由人地矛盾产生的。他们认为，20年来的实践证明，农业土地经营的小型化并未妨碍技术进步，农民兼业的收入使得小土地经营也可以得到维持。在非农产业发达、就业渠道较多的地方，一些农民开始转业，并将土地转包给集体或种田大户，从而出现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新现象。我们的政策应该是顺其自然，不能硬性规定规模经营的形式和进程。

王庭东则从经济转轨的角度就中国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与特点进行了分析与归纳，简单地评述了目前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六类思路，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几点建议。宋士云回顾并总结了50年来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大致历经了三次模式的选择：1956~1978年主要依靠集体公益金运行，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组织实施的集体供养模式；1979~2001年以村提留和乡统筹为其经费和实物来源的集体供养模式；2002年以来以国家财政供养为主，集体保障、土地保障和社会帮扶为辅的现代社会保障模式。

常明明以建国初期中南区豫、鄂、湘、赣、粤五省为中心，对建国初期国家农贷问题做细致的实证分析。庞松、苏少之专门探讨了新富农党员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发生和处理，需要从历史缘由、认识差异和变化两个层面作动态分析。

(刘兰兮执笔)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价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

